

《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评介

——一部西方人眼中的中国环境史

刘煜泽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 天津 300350)

摘要:《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一书,是关于中国环境史研究的第一部通史性著作。作者马立博在广泛吸收西方史学界对于中国环境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环境史的角度对中国从史前到现代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同时,作者在该书中也对中国古代环保思想、中国古代市场发展与环境等一些专题做了较深入的探讨。当然,单一运用西方研究成果对中国的研究,不可避免有一定的局限。

关键词:马立博;中国环境史;环境变迁;环保思想

中图分类号:K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639(2017)04-0028-04

DOI:10.14091/j.cnki.kmxyxb.2017.04.006

On China: Its Environments And Histor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Western World

LIU Yuze

(History College,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China 300350)

Abstract: *China: Its Environments And History* is the first general historical works on the research of Chinese environmental history. On the basis of the achievements of China's environmental history research, Robert B. Marks has made a detailed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At the same time, the author gives a more in-depth discussion on China's ancient idea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market development and the environment. However, limitations are found for the research with the unilateral western research achievements.

Key words: Robert B. Marks; Chinese environment history; environmental changes; thought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中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同时中国环境史问题涉及面极广,有关文献资料相对缺乏,再加上中国环境史的研究尚未得到深入发展,因此要完成一部中国环境通史有相当大的难度。国内目前尚未出现一部关于中国环境史的通史性著作,而美国学者马立博教授则率先完成了第一部中国环境通史性的著作。

马立博(Robert B. Marks),西方著名的中国史、全球史、环境史学者,对于中国环境史有着深入的研究,曾发表过“Commercialization without Capitalism: Processes of Environmental Change in South China, 1550—1850”“Price Inflation and Its Social, Economic, and Climatic Context in Guangdong Province,

1707—1800”等多篇论文,1998年其完成了有名的关于中国断代区域环境史著作“Tigers, Rice, Silk, and Silt: Environment and Economy in Late Imperial South China”(此书的中译本《虎、米、丝、泥:帝制晚期华南的环境与经济》于2011年出版)。

《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一书,英文原版为“China: Its Environments And History”,于2012年由Rowman & Littlefield出版。其中译本则经关永强、高丽洁完成翻译,于2015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分为8章,共计53.5万字。书中,作者广泛吸纳西方世界对中国环境史的研究成果,对中国从原始社会到21世纪的各项领域的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进

收稿日期:2016-11-13

作者简介:刘煜泽(1993—),男,山西临汾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明清区域经济史研究。

行探究,并在某些专题方面提出了较为深入的看法,如关于市场为纽带连接上层政府与下层农民家庭的改造自然的模式、汉民族逐步的扩张及其改造自然的单一模式、中国古代环保思想及其效用等。作者在面对持续时间长、地域范围广、涉及学科领域众多与相关文献史料短缺的情况下,能完成这样一部开创性的著作,确实对于中国环境史的研究具有不少启迪性的作用。但书中作者单纯使用西方理论成果对中国环境史进行研究,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诸多问题也不容忽视。此前该书译者关永强等人已有专文对其进行了相关介绍,这里笔者将在此基础之上,先对作者思想进行梳理,而后对此书几个较有争议的问题进行讨论,最后对此书做一个总体评价。

《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由引言、正文、结论、参考文献和索引组成。其主要以时间为顺序论述中国环境史,展现出来一部“中国环境破坏史”。引言之中作者即指出中国四千年历史上的环境破坏,而本书的目的就是“将试图讲述这个巨大的环境变迁故事是如何以及为何发生的”^{[1]1}。作者认为,正是生活在中国土地上的人类四千年来建立的“独特文明形式”^{[1]1},改变并消耗了自然环境,从而实现了自身长期的持续性。

本书正文以时间为顺序,“以环境为主题,将其置于传统的中国历史分期框架之下进行探讨”^{[1]13},从第二章正式开始展开对中国环境史的研究。在作者的论述中,“中国”这一概念是在不断发展中才形成的。在这片土地上囊括了众多的生态系统,其独特的自然环境为中国最早文明的出现准备了特殊条件。在中国五个地区,分别独立出现了农业,久而久之形成了南稻北稷的模式,并在中央政权的保护之下,集约型的家庭小农耕作的中国式农业开始出现。由农业出现而产生的生产力发展,以及气候的暖湿、统治集团的出现,结果就是“中国相互作用圈”的形成,拥有发达青铜文明的商朝也由此诞生。从农业出现开始,同环境变化的相互作用相应发生,于是,“早在三千年以前,中国人已经对环境施予了显著的影响”^{[1]64},这种影响随着“中国相互作用圈”的完善不断扩大。但史前人类对环境影响能力极小,当时中国人并未大范围改造过环境。

进入早期帝国时期的中国,一方面是“定居农业、战争与精英集团的共同作用导向了一个新的局面”^{[1]72},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的复合体形成并不断延续。同时“家庭式农业通过与货币化的市场经济相连接的税收和劳动力,构成了中央集权制官僚政府的基础”^{[1]74}。中国改造自然的基本模式,在这个时期已经基本形成。另一方面,游牧民族也开始在中国边疆用自己的方式改造自然,早期的汉夷冲突由此展现。从周到战国再到秦汉的首次大一统而出现大规模工程,对北方自然资源的开发逐渐密集化。与此同时,伴随环境的破坏,中国出现了早期完备的保护环境的思想。但是,这种思想基本属于空谈,未付诸实际。伴随着环境的大规模破坏与瘟疫的横行,汉王朝走向灭亡。汉朝灭亡后,中国进入帝国中期,伴随着气候的转冷,造成了北方汉族生产的下降与少数民族南迁,结果就是汉夷冲突的严重加剧。两晋南北朝在北方的斗争中,少数民族取得了完全的胜利,而汉族被迫南迁。长期的开发与战争,中国北方的森林环境遭到了巨大的破坏,汉人的南迁又导致汉族社会模式的扩大、水稻的单一种植模式在南方广泛推广。随后的大一统之中,汉民族在疟疾等阻碍因素与新技术开发的背景下,继续向四周扩张。这个时期还需注意的是黄河的泛滥开始加剧,大运河的开凿也极大影响了北方周边环境。

到了帝制晚期的中国,“人口规模、人口密度和经济的商业化都对环境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1]216}。人口的迅速增加,带来了环境的巨大压力与环境开发的巨大转变。等级结构的体系支配地位的确立,使得对自然开发的效率急剧增强。中国的扩张仍在继续,周围边疆地区不断纳入汉族社会模式。此时中国的工业产量与农业产量都位居世界第一,而其基础则是对环境资源的大力开发,中国也到了它的生态极限。虽然生态已经到达了极限,但面对需求压力,结果就是对资源进一步开发,山区丘陵也被纳入其中。这样带来的就是全国性的环境危机。近代前期的扩大的中国与太平洋地区的贸易中,为满足与中国的消费需求,国外的资源开发也对环境造成影响。随着中国进入列强支配的近代,外国人进入中国又开始了新的资源开发与环境破坏。边疆过度开发与森林过度砍伐带来的环境危机和其他危机连锁反应而导致严重社会危机。其后,中国共产党继承了一个已经严重

退化了的自然环境。

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中国统治权之后，“标志着一个国家意志推动迅速实现工业化的新时代的开始”^{[1]349}。在满目疮痍的土地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在60年中已经从一个农业社会转变成成为全世界规模最大，然而也可以说是污染最严重的工业经济体之一”^{[1]349}。毛泽东时代与后毛泽东时代虽然对于发展理解有差异，但相同的都是快速发展中国经济。同时在支配自然的思想之下，毫无环保意识的发展导致了此时段环境问题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进入21世纪，中国的环境问题已经不可能忽视，环保组织与环保活动已经不同程度展开，但是其结果我们不得而知。

在该书的结论中，作者对书中提出的主要思想做了较为系统的总结，归纳了中国环境史研究中的重要议题，即1949年问题、中国生态恢复弹性以及水、森林等问题，又总结了贯穿全书的中国环境变迁的诸多驱动因素，如政府、市场、技术、文化、人口等，并把中国环境史置于世界历史背景下进行了考察：中国有其巨大的独特性，“中国及其历史在很长的时间里都不只是世界历史趋势的一部分，而常常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推动力”^{[1]457}，同时也存在与世界其他地区巨大的同步性；现今的中国政府虽然已经开始大力行动，但是如同古代一样，中国环境问题依然持续恶化，中国的生态系统也在逐渐失去其回复弹性。

二

中国环境史这门学科，尚处于年轻阶段。在一本书中探讨其四千年以来的所有环境史问题，本来就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马立博在中外学者中首次完成了这项任务，这是值得我们肯定的伟大工作。在作者第一部专门探讨中国环境史问题的著作《虎、米、丝、泥：帝制晚期华南的环境与经济》中，作者按照与布罗代尔模式相对应的两个层面探讨中国岭南断代环境史问题，是对“中时段”历史的研究。而在《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中，作者将研究的时间与范围扩大到中国全境与全部时段，完成了对中国环境史“长时段”的研究，完善了自己的体系。此前伊懋可教授完成的《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同是对中国环境史研究“长时段”的著作。该著作由模式、特例、观念三部分组成，分专题区域性质的探讨中国

政治、经济、文化与环境的互动关系。与伊作相比，马立博的著作则更注重按时间顺序进行论述，规划出了中国由古至今的环境史体系。

在《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一书中，作者谈到，人类从来就是属于自然的一部分，虽然人类的“文化”是在讨论环境史问题中不可缺少的命题，但更多的焦点则放在了作为环境变化的驱动因素——人类的经济行为之上，“经济增长、发展和社会进步几乎总是不可避免地需要利用自然资源”^{[1]7}。一般讨论历史问题尤其是经济史问题，环境因素基本都被当做背景影响因素定位。而该书则把经济问题作为影响因素来探讨环境变化。作者最突出的观点就是从市场问题来展开讨论。20世纪美国学者施坚雅在三篇论文中提出了著名的施坚雅市场理论，引起了西方学界的轩然大波。“施氏原意，不过是要纠正人类学家只着眼于小社团的倾向，但结果几乎完全消灭了他的对手。”^[2]在此理论影响之下，马立博着眼于从市场理论开始对环境史的影响。事实上，中国自汉代起市场已经逐步形成，到16世纪已经相当完善。传统中国以市场为枢纽，上层中央政权与下层小农家庭相结合，千千万万的小农家庭支撑国家机器的运行，国家也为小农提供安全保障、基础设施的修建等，从而构成了强有力的开发自然资源的方式，支配了中国千年以来的经济活动。这种方式它可以使某一地区的人们专注于生产一种或数种商品，而使自然改造单一化。“市场也可以把单个地区人们对某些商品的有限需求汇聚成为规模大得多的消费者群体和市场需求，从而使得从某些很遥远的地区生产和收获这些产品在经济上成为可能”^{[1]222}。而后的扩大的对外贸易，展现了中国市场对全世界上多个地方环境的强大影响，外部的市场在近代也造成了中国生态环境的极限。

相比于国内主流视野，马立博强调汉族与其他民族的相对的论述。作者的观点在研究中国环境史甚至中国史中，当然是不能忽视的。中国文化多源起源，在“中国”不断形成的过程中，“‘中国’的生态环境变化不仅仅是由‘汉人’造成的”^{[1]3}，不同民族不同程度上都对环境变化产生影响，而中国的环境史显然并不是多个民族千年以来共同书写的。作者的这个观点可以看到很多“新清史”的影子，“汉人”以原来的黄河流域为根据地，千年以来

一直持续与“非汉人”的冲突,在“非汉人”与“汉人”不断的冲突摩擦中,“汉人”不断融合周边民族,逐渐成为开发中国自然环境的主要支配者,“中国环境史在很多方面其实是在叙述汉人怎样从其他族群那里获取已经被他们改造并适合他们生活方式的土地”^[14],虽然其他民族也通过一定方式改变汉人,但最终汉人则将自己单一的文明模式扩大。

中国的环境不断遭受开发与破坏,但是中国则展现出了非凡的可持续性。作者对此给出的解释就是:“过去四千年来中国环境史最重要的趋势,就是自然生态系统被简单化成了一种特定形式的农业生态系统”。在市场的互补之下,通过不断征服,结果就是中国环境的单一化。“中国的环境史是一个环境、人类和社会制度不断趋于单一化的故事。”^[11]“汉人”创造了单一的生态环境,其他民族不断消亡,汉人的社会模式不断扩大。

相比于国内学者袁清林的《中国环境保护史话》、陈业新的《儒家生态意识与中国古代环境保护研究》等书展现的中国古代环保思想与环保运动的实践,马立博的另一个显著命题则是,虽然千年以来中国形成了完备的生态意识体系,但是基本没有付诸实际。老子曾言“道法自然”,对待自然中华传统文化历来主张“天人合一”,但这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在中国大多数历史阶段中都是反思性质的空谈。

三

不可否认,马立博的《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这部著作有着巨大意义,但作为第一部同时也是出自外国人之手的中国环境通史,其也有很多地方引起了国内学界的争议。

本书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作者非常广泛地采纳了西方史学界关于中国环境史的研究成果,包括施坚雅的市场理论、黄宗智的“过密化”理论等等。纯粹采用西方理论方法而基本不使用中国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这应该算是此书的一大遗憾,这也导致作者在很多地方陷入了单方面视角的误区。中国环境史学科目前虽然处于起步阶段,但王利华等人也逐渐取得了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讨论大量中国历史问题而直接无视中国国内的研究成果,这样的做法显然

是不妥当的。如中国古代市场问题,许檀、邓亦兵等人的研究是不能被忽视的。实际上,从此书在对中国环境史问题的探讨中,可以明显看到其史料的不足,它的第一手资料的使用是非常薄弱的。

当代历史研究的走向,越来越变成“看不见人的历史”。但马立博这部环境史,似乎“人”显得太多了。该书为了拥有更多的读者,为了让不懂中国史的人看明白,对于中国的其他历史发展介绍过于详细繁琐。如从环境史的角度探讨了诸如大运河修建等大量传统史学的话题。读完这部通史之后,给人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这样的印象,作者似乎是将环境史的观点直接生硬地加入到了中国历史的框架内:我们更多地看到了一本大历史,而非一部人与自然环境互动的历史。

除此之外,通观这部著作,作者对中国环境的变迁基本上充满了浓厚的消极评价。这部作品与其说是中国环境史,倒不如称为“中国环境破坏史”。比如,作者描述的中国市场与海外环境问题,将二者联系起来是可以的,但是将海外环境破坏完全归根于中国,基本忽视了卖方市场的作用,这显然有失偏颇。另外,全书所带有的中国衰亡与黑暗色调,也是本书的一个西方视角过于强烈的反映。

当然,毋庸置疑,虽有瑕疵,但此书毕竟是中国环境史研究的第一部通史性著作。作者马立博在广泛吸收西方史学界对于中国环境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中国从史前到现代历史进行了详细的环境考察,其有很多地方是值得我们借鉴与学习的。如作者在书中大量使用理论框架研究中国历史,这正是国内史学界所缺乏的。事实上,马立博的这部著作对中国环境史的研究有着非常大的贡献。应该看到,中国环境史的研究刚刚开始,有关中国环境的故事还亟待讲述,也需要被更多的人理解,因为中国环境史的深刻意义不仅关乎中国,更关乎整个世界。

[参考文献]

- [1] 马立博. 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M]. 关永强, 高丽洁,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 [2] 黄宗智.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23.